

# 六十年前的记者证

我素来以码字为乐,加之工作多与宣传口的打交道,故而本地报纸中有不少记者朋友,也曾因积极投稿被笑称为“没有记者证的编外记者”。不过我的手中却真的藏有一份记者证,原是我的舅外公持有,后来转赠给了我。

这张记者证是用白色老棉布制作。长约10cm,宽约6cm。正面正中印有红色的“记者”两个大字,右下角是记者证的编码“右翼兵团宣传部第17号”,外侧是一圈五边小花的边框作为装饰。记者证的背面是钢笔书写的舅外公的部队及姓名“驻一师,庞文全”,正中还加盖了红色公章。从背面一圈线头及记者证的大小和材质可以看出,这张记者证是缝制在上衣的臂弯处,相当于臂章。据舅外公回忆,这张记者证大约颁发于1955年。那个时候的他参军入伍不到一年,因为家里成分好,是贫雇农出身,加之读了高小,又喜欢写写画画。所以到了部队不久,就被分配专门从事兵团报纸的编写和印发工作。白天采访那些火热的训练和建设场景,敏锐地去发现事实,晚上则在油灯下赶写新闻稿。那个时候兵团宣传部人手不多,条件简陋,舅外公身兼编辑、校正等多种职务。常常是刚停下了写字的钢笔,又拿起了油印的钢针笔,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舅外公从部队转业后安置在老家的乡政府当了一名干事,后来又辗转于邻近几个县镇。但他一直都没放下对文字的热爱,屡屡有作品见诸于报。直至他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日日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泡上一杯热茶,戴上老花眼镜,细细翻看每天的日报和老年报刊等,常以找出错字为乐。因为兴趣相投,舅外公平时最爱和我聊天,他常常教育我不能忘记写作的初衷,不要为利益所诱写出违背良心的东西。

今年的11月8日是中国的第16个记者节,可舅外公已经不能欢度这个节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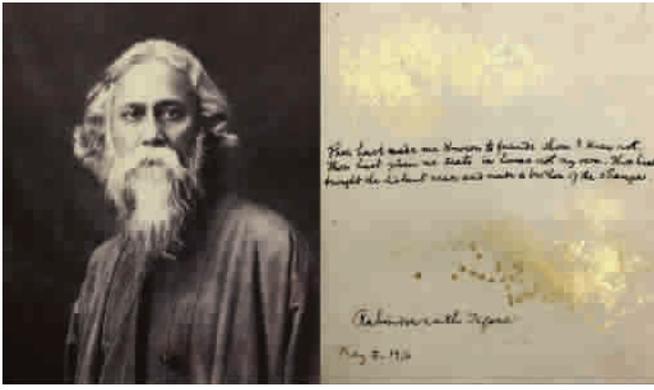
亲自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64岁生日祝寿会。徐志摩则毫不隐瞒对泰翁的崇敬之心:“可称之为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就在泰翁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的当天,志摩等三十余人早在汇山码头翘首以盼,一拥而上给他戴上花环,泰翁见了欢迎他的中国友人也情不自禁说:“不知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

的确,上海向泰戈尔敞开了友好的胸怀,在沪期间志摩以接待人和翻译身份不离泰翁左右,偕同共去龙华赏桃花、参观哈同的“爱丽园”、赴杭游览西湖等地,与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出席各界欢迎他的集会,多次作了公开演讲宣传他的理想:爱、宽容及和平。数年后他重访上海时,直接住进徐志摩的家中,亲如家人,志摩也是从他身上找到了爱、美、自由等一切他所崇敬的元素,融入诗人的血液里。

“天空不曾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要走了,徐志摩告别时问他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泰戈尔回答:“我把心落在了中国了!”

如今在上海“四明邨”外墙上,还可以看到刻着泰戈尔的诗句,走到南昌路茂名路口,耸立着泰翁的雕像,他正以睿智的目光静静凝视着这座熙来攘往的魔都。

## 泰戈尔诗笺 ◆ 王金声



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如今这位文化巨匠的手迹从东瀛流到中国,入藏寒舍不能不说是缘分使然,泰戈尔的名字不仅连缀着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梁启超、胡适等诸崇拜者的名字,且与上海的渊源也非同一般,他三次造访中国,三次来到上海,这是他在1924年4月至5月、1929年3月和6月的逗留地。他的来访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盛事,不过也引来知识界两派对立的纷争,争论的焦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孰优孰劣,郭沫若首以一篇

《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当年最早将泰戈尔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也发表多篇评论,恭请泰翁“不必多放蕩言乱我思想界”,就连鲁迅也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给他取了个含义深长的中国名字“竺震旦”,胡适称泰戈尔为“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

初来寒舍的友人,往往对客厅墙上挂着名家书写的吉光片羽津津乐道,十之八九驻足在一帧英文题辞前饶有兴趣,有懂英文的也弄不清楚谁写的,我总笑而不答,碰到逼问的才如实相告,“噢!是泰翁啊!这人你也有啊?”我开始得意起来,告诉人家这是印度诗圣泰戈尔亲笔书写《吉檀迦利》中的诗句:

Thou hast made me known to friends whom I knew not. Thou hast given me seats in homes not my own. Thou hast brought the distant near and made a brother of the stranger.

就是这部《吉檀迦利》的诗集,让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泰戈尔于1916年5月起程赴美,途经日本停留了三个多月,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泰翁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异常兴奋地登上车头参观,并在一张洒金笺上用英文书写了一段《吉檀迦利》中的诗句,亲赠火车司机表示感谢。还好这句诗的译文倒不费周折,冰心曾翻译过这本《吉檀迦利》,现成拈来:“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落款

钱行健先生是海上颇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五年前不幸患病去世,时年七十五岁。美术圈里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身上或许依附着各种光环,诸如职务,地位,人情关系等等,人一旦走了这些光环都将退去,余下的只有他的作品。作品是会说话的,其优劣好坏,后人自有公论。假以时日妙笔佳作必有慧者识之。

笔者与钱行健先生生前交往颇多,对其绘画生平和绘画艺术了解甚深,窃以为他是海派花鸟画“四大花旦”(唐云、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等老一代名家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花鸟画家。钱行健先生的花鸟画得画理,随心所欲尽入法度;求写实,禽鸟花枝无不精准;重笔墨。以书入画气韵生动;能变化千姿万态自出新意。艺术大师程十发曾说“钱行健的花鸟画是海上画坛优美的风景线”,称赞他的作品“生机勃勃,凝重典丽,大气磅礴。”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位成功的画家除了个人才气天分之外其背后大凡都有一段艰辛的经历。

钱行健先生自幼好画画,早年拜海上名家江寒汀为师。参加工作后当了一名钳工。众所周知,钳工是体力活,一天干下来已经很累

## 钱行健及其花鸟画

◆ 张溪

了,但他醉心于学画,那时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要伏在一张小方桌上画到深更半夜。他曾讲起,大热天,有时画完了拿个小板凳到门口去乘一会凉,但见门外已经灯熄无人了。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所谓不得其形,神将焉附。那些年没有今天这么多绘画的图书资料,为了掌握鸟的结构形态,钱行健先生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到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画鸟的标本。然后自编了一套鸟类形态草图并注上各种鸟的产地、体态、色彩和生活习性等,还编了一首画鸟歌诀。然而标本是不活动的,为了掌握鸟类的动态他就不断去写生。遇到星期天或节假日,他就带上两个馒头一壶水,骑上一辆自行车跑到西郊公园去写生,往往清晨出去,天晚回来。有次闲聊他曾对我说,鸟的有些动态如果凭空想象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中国画传统有书画同源之说,钱行健深知其奥。年轻时曾苦练书法,后写得一手自体散隶也堪称独步。中国画以

线为骨有“千古一线”之谓,钱行健先生以书入画。作画用笔无论轻重徐疾粗细虚实其线条均柔中有刚耐人寻味。中国画讲究传承,他曾大量临摹宋元明清名家作品,遂得古人用笔用墨之妙。学习古人前人,继承传统但又不能停留在古人前人的台阶上,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钱行健先生之所以能出类拔萃,后来名声鹊起,成为海上传统花鸟画的一位领军人物,究其原因主要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求新求变自立面貌。比如他画鹰,面部是从戏剧脸谱中的大花脸中变出来的。所以钱行健先生的许多作品既传统又别出新裁颇具现代气息。

一九九八年春,钱行健先生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后经抢救虽然度过危险,但右手功能变得不能握笔。为了能够继续画画,钱行健先生毅然决然地苦练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又能提笔作画,乃至扇面和工笔小品,恢复如初。

钱行健先生的一生亦恰如其名,正是《论语》所言“天行健,



■ 钱行健绘《雪竹鸳鸯》

君子以自强不息”者也。他外朴而内慧,志向高远,勤奋好学,敏于事而慎于言,谦恭和善,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海上业内人士有口皆碑。如今许多朋友和收藏家都拥有他的作品,笔者愿大家赏之宝之,以此来纪念他吧。



## 宝剑:文房中见豪气 ◆ 朱亚夫

始祖黄帝,据《史记·黄帝本纪》:“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原来“天下第一剑”是黄帝所铸,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至商代,已有明确的制剑记载。及至春秋战国,在群雄争霸中,到处刀光剑影,剑更是大放异彩,一代剑师也就脱颖而出。据《越绝书》载:春秋时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阿”,“工布”。也有传说,以上三剑为欧冶子与其婿干将合铸。此三剑,乃天下名剑,都有一番故事,比如,龙渊剑,全称“七星龙渊剑”,相传当年欧冶子寻觅多年,最

后他来到了龙泉的秦溪山旁,发现在两棵千年松树下面有七口井,排列如北斗,明净如琉璃,冷澈入骨髓,实乃上等寒泉,就凿池储水,即成剑池。经两年之久,终于铸剑三把,于是他将第一把剑名为“七星龙渊剑”,缘因俯视剑身,如同登高而下望深渊,飘渺而深邃,犹如巨龙盘卧,持此剑所向无敌。唐乾元二年此地置县就以它为名,是为“龙渊县”,后因避唐高祖名讳“渊”字,改叫“龙泉”,“龙泉宝剑”至今名扬天下。

当然名剑并非此三把,还有成就侠士之剑,如专诸刺吴王僚的“鱼肠”剑;有突显竞业,生死相许之剑,“干将”“莫邪”雌雄剑是也。有彰显

英雄豪气之剑,如刘邦当年以“赤霄剑”斩白蛇起义,从此号令天下;唐汾阳王郭子仪身佩的“玉柄龙”,是将师之剑,可号令三军,平定乾坤……

宝剑移师文房,照样豪气冲天。一代文仙屈原“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怨”,“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可见他利剑不离身;诗神李白,年轻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宝剑常佩在身,有名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诸葛亮的“草庐”名重天下,其壁上就赫然挂着一柄七星剑;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书房“稼轩”传世,可他在文房中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近代学者瞿启甲,因藏“古琴一

把,铜剑一柄”,乃命藏书室为“铁琴铜剑楼”,虽历经四代,至今犹在;而现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年轻时,正值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立志反清,向往革命,因欣赏唐代诗人贾岛诗《侠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汲取诗中豪情,遂起斋名“磨剑室”。

当然,现在人们在书房中藏剑,大多是作为镇宅避邪、装饰美化之用。笔者也不能免俗,书房中也有好几宝剑,如图这把东方剑,那是上海《东方剑》杂志社,于20年前(乙亥年),萌发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子,为答谢作者而特地从宝剑之乡——浙江龙泉定制与其杂志同名的宝剑“东方剑”。剑鞘镶铜,剑身长约三尺,上镌“东方剑”,宝剑直而不曲,刚而有韧,寒光闪闪,确是一指好剑,正好当作镇宅之宝。